

中国对日政策

ZHONGGUO DUIRI ZHENGCE YU

与

罗平汉/著

1949—1972年
中国对日政策研究

中日邦交正常化

ZHONGRI BANGJIAO ZHENGCHANGHUA

时事出版社

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1949—1972 年中国对日政策研究

罗平汉 著

时事出版社

中国对日政策与

中日邦交正常化

1949—1972年中国对日政策研究

◆
罗平汉 /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1949—1972 年中国
对日政策研究/罗平汉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0
ISBN 7-80009-600-9

I. 中… II. 罗… III. 中日关系-对外政策-研究-
中国-1949~1972 IV. D822.2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8904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 100081)

发行热线: 68797590 68797595

传 真: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18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序

本书是以新中国自成立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间的对日政策为研究对象的，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这次出版恢复了删去的部分，并作了一些新的补充，使内容更充实。

作者攻读的专业方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政治、经贸、地缘等因素，中日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又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就依据国际形势、日本政局及其变化，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和两国邦交的正常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总的来看，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而对中国对日政策的系统研究相对来说则比较薄弱，成果比较少。因此，加强这方面研究，不仅是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作者为论文做了充分准备，尽可能收集有关的中文资料，并阅读了大量日文资料；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首先进行阶段性的研究，发表研究成果，然后扩展为博士学位论文，为写作打下比较扎实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直到1972年才实现了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中日关系的发展为什么艰难曲折困难重重？又怎样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作者紧紧围

绕上述问题，全面分析制约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各种因素，诸如：日本政局和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变化、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日美关系，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等；特别是着重系统地分析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的对日政策及其发展变化，阐明中国对日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客观地评析中国政府采取的正确政策在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中也展现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外交艺术。作者表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日本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给中日关系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但是，中国政府根据广大日本人民包括一些政界人士要求日中友好的情况，制定了民间外交、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方针和相应的一系列政策，以渐进积累的方式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最终使两国复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参与对本论文评议和答辩的专家、教授一致认为：论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间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及其形成、演变、实施结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评析；其中，对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影响中国对日政策的诸多因素、中国对日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分析；论文弥补了国内学术界对这些方面研究的不足，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作为博士论文的导师，过去对中日关系问题，只是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有所涉及，缺乏深入的研究。这次指导作者写作论文的过程，也是自己深入学习、研究的过程，从中学到不少东西。现借论文出版之机，写了以上一些话，算做是提供一点论文写作的背景材料，供读者参考。

何沁

2000年3月

前 言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日两国有着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但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页。日本法西斯的彻底被打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本为中日关系摆脱因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歧路，使之走上健康发展之途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及冷战体系的形成，当时的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无视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台湾当局缔结了所谓的“和约”，建立“外交”关系，导致中日关系长达 20 余年的不正常状态。此间，虽然中日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的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常处于一种进一步，又退后一步状态，直到 70 年代初，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和中美关系的改善，并由于中国政府、日本有识之士和两国人民的长期不懈努力，田中内阁终于迈开了中日关系史上的关键一步，与中国领导人一起共同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实非坦途，历经 20 余年的曲折磨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既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也是两国人民多年努力的结果。对战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曲折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研究，对于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正确认识战后以来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珍惜

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合作局面，促进未来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使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无疑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对于这一点，不少研究者已经做了，或正在做之中。自 90 年代以来，国内已有多本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包括中日经贸关系史的著作相继问世。在日本，也有一些研究日中关系的学人，站在他们的角度，利用他们掌握的资料，写出了诸如《战后日中关系史》、《日中关系（1945—1990）》、《日本外交与中国》等著作。中日学者有关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著述，虽然其立论、立场、观点、角度都有所差异，但经过他们的工作，梳理了战后中日关系演变发展的脉络，让人们能够明了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轨迹；其中不乏有价值之作。

对战后中日关系演变过程的梳理和描述，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同时也应看到，战后中日关系的曲折变化，除了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外，实际上受制于中日两国政府制定的相互政策，战后吉田茂、岸信介等几届日本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是导致中日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根本原因。吉田政府的对美一边倒外交政策前提下制定的敌视新中国的方针，以及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与蒋介石集团订立的《日华和平条约》，为中日之间不正常关系的形成埋下了祸根。日本政府把日台“条约”和日台“外交”关系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后，即使鸠山一郎、池田勇人这样比较开明，主张在中日关系上有所作为的日本政治家，也被其缚住了手脚，迈不出关键性的步伐，直到田中角荣才把这个绞索解开。1972 年 9 月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固然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美、日美关系的变化分不开，更重要的是进入 70 年代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完全成熟，并且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在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田中是有贡献的。然而，客观而论，田中的贡献，除了他的“决断与实行”的勇气外，更为值得赞赏的是他顺应时势，顺应民心，顺应中日关系发展大潮的胆识。但是，如果没有 20 余年中日

民间外交的积累，没有两国人民间友好关系的发展，田中即便有勇气和胆识，也难以打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门。而这一切，又是与中国政府制定的民间外交、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等正确的对日政策分不开的。

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与中国同其他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相比，具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中日之间是战胜国与战败国、被侵略国与侵略国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在邦交正常化之前一直存在。其二，战后日本对美国的依赖、从属性质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日本被美国占领的同时，政治、经济、外交都受制于美国，旧金山和会之后，日本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但日本仍然得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而美国从其全球反共战略出发，采取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这样，中日关系必将深受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制约。其三，日本被美国纳入旧金山体系之后，在选择北京还是台北发展关系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没有与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缔结和约，建立外交关系，反而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与沦为中国地方政权的蒋介石集团相勾搭，缔结所谓“和约”，陷入日台关系的泥坑之中，使日本政府长时期没有拔出脚来。于是，中日之间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就必须废除日台“和约”，与台湾当局“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如果日本政府在这些问题上没有明确立场，中日邦交就无法实现正常化。

正是针对战后中日关系的这些特殊性，在日本吉田茂政府错误地与台湾当局“媾和”、“复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时还不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认为，尽管中日官方往来和官方关系确立的条件还不具备，但强烈要求发展两国关系的日本人民和日本有识之士将是推动中日关系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制定并且执行了“民间先行、以

民促官”的民间外交方针，首先着眼于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进而吸引众多的日本文化界、经济界甚至政界的有识之士加入到中日民间外交的行列。这样，经过多年的渐进积累，不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其错误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广泛而持久的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群众运动，也使日本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认识到中日恢复邦交、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敦促日本政府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到了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田中角荣一上台，就果断地作出了中日复交的决定，并亲来北京进行复交谈判，终于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可以说没有民间外交的积累，田中在上台不久即很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难以想象的。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方面没有什么困难。对中国来说，不存在一个日本还是两个日本的问题，也不存在谁是日本唯一合法政府的问题。但对于日本来说，要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就必须在承认一个中国还是在制造“两个中国”问题上作出抉择。如果只承认一个中国，又必须在这个“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所谓“中华民国”问题上作出明确表态。“两个中国”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的，承认早已被推翻的“中华民国”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日本要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就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断绝同台湾当局的一切政治关系。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不顾蒋介石集团不过是中国一地方政权的客观事实，与台湾当局“订约”、“复交”，在作出违背中日两国人民意愿的错误选择之后，又不改弦更张，而在保持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的同时，不断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使中日关系长期陷入不正常状态。

即使如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错误选择与顽固立场的同时，并没有由于中日之间存在的不正常状态的形

成而无所作为。相反，在朝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发展中日两国，特别是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的总目标下，制定了诸如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分开对待，以积累渐进方式改善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政经不可分、复交三原则等一系列的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使日本国内主张日中复交的人越来越多，也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具备了日益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终使两国复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切实可行的对日政策及其产生的巨大作用，中日复交的过程还会更复杂、更曲折，中日关系不正常状态存在的时间也会更长。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终实现，是中国开展的民间外交、人民外交活动的一个典范。因此，就中国对日政策的本身进行系统的分析，既有助于战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也有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深化。

本文所进行的中国对日政策研究，拟将时限界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这个范围内。理由是，这里所指的中国对日政策，实际所要探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政策。自然，战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也有它的对日政策，正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没有执掌全国政权，但也有自己的对日政策，本书不打算将此列入所研究的对象。所以，也不准备以战后中国对日政策研究为题。以1972年9月为下限，则是考虑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中国对日政策所结成的一个丰硕成果，也是20余年中国对日政策成功与否的最好验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使中日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形势变了，中国的对日政策也相应有了调整，对此，本文限于篇幅，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中国对日政策暂不涉及，留待以后作进一步的研究。按理，本书以中国对日政策研究为题，显得过于笼统，为了避免歧义，特标明“1949—1972”以界定研究范围。

中国的对日政策是具有连续性、一贯性的，但同时又有它的灵活性、针对性。中国的对日政策又是与日本的对华政策相联系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日本经历了吉田茂、鸠山一郎、石桥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等七人执政阶段，其中，石桥执政的时间很短，其余几人的执政的时间都较长，而且他们的对华政策也不尽相同。这几任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总的特点是：吉田反共反华；鸠山主张改善中日关系；岸信介继承了吉田的衣钵；池田对华政策大体恢复到鸠山时期的水平，并使中日关系发展到了半官半民状态；佐藤继任池田之职后，在中日关系上大开倒车；田中则采取了与佐藤截然不同的对中国政策。历届日本政府这种对华政策的一退一进，使中国对日政策在坚持基本的原则方针的前提下，也适时作出了针对性的调整。因此，本书拟根据吉田以来日本几届政府的任期，就中国的对日政策作阶段性的分析。

对日政策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日政策必须符合中国整个对外政策的需要，同时也受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不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体负责者是周恩来，因而国内“左”的干扰对外交方面的影响，与其他领域相比，相对要小一些，务实性也强一些。所以，书稿中并没有对制定对日政策的国内背景作过多的交代。中日关系受中美关系的影响、制约，是无庸置疑的。中美关系感冒，中日关系打喷嚏，是人们对中美日三角关系的通俗化形容，因而文中不免要对中美及日美关系作必要的分析。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概括地来说，主要是台湾问题和对过去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问题，以及与后者相关联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如何对待台湾问题和如何认识过去的侵华战争，最能体现日本对华政策的本质。自吉田以来的日本历届政府对此的态度虽各有不同，但并无实质性的变化，直至田中执政，日本政府在这两个问题上才有比较正确

的态度和比较深刻的认识，这正是田中能够迈出中日复交步伐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台湾问题及与日本侵华战争相联系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上，一再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两点几乎成了中国对日政策不变的话题，因此，文中对此也不免时常论及。

中国的对日政策影响甚至决定着中日关系发展方向，要对此进行系统的分析及客观、准确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笔者目力所及，迄今为止，对新中国成立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这段时间的中国对日政策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著作，尚不多见。基于此因，对此进行一点初步的研究，抛出一块引玉之砖，或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研究有所裨益。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新中国对日政策的初步形成	(1)
一、主张全面对日媾和,否定非法的《日台条约》	(1)
二、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	(10)
三、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启动民间外交	(15)
四、中日之间僵持状态形成原因透视	(21)
五、中美关系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6)
 第二章 民间往来、官方挂钩方针的制定与实施 ...	(31)
一、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与中国的积极回应	(31)
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批评、驳斥“两个中国”的错误言论	(42)
三、民间往来、官方挂钩	(50)
四、中国对日政策表现出的灵活性	(56)
五、鸠山对华政策的矛盾	(60)
 第三章 政治三原则与政经不可分	(67)
一、50年代后期中日关系的逆转及其原因	(67)

二、政治三原则与政经不可分原则的提出	(82)
三、反对美日军事同盟,支持日本人民安保斗争	(94)
四、为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努力	(102)
第四章 推动半官半民外交局面的形成	(110)
一、贸易三原则的提出与友好贸易的发轫	(110)
二、半官半民关系的形成	(120)
三、渐进积累方式的确立	(136)
四、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与间接同盟军问题 ...	(148)
第五章 对日态度的强硬与贸易政治化	(156)
一、佐藤的“变脸”与中国的反应	(156)
二、“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问题	(167)
三、备忘录贸易中的政治优先原则	(178)
四、友好贸易的进一步政治化与贸易四条件	(186)
五、钓鱼岛问题的凸现与中国的原则立场	(191)
第六章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200)
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与中美接近	(200)
二、中国对日政策的调整与日本复交运动的高涨	(206)
三、不以佐藤为复交对手与复交三原则	(212)
四、田中角荣的“决断”与中国的积极行动	(220)
五、在复交谈判中对几个重要问题的立场	(237)
结束语	(250)
参考文献	(256)
后 记	(261)

第一章 新中国对日政策的初步形成

一、主张全面对日媾和,否定非法的《日台条约》

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时,就十分重视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时,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同时,就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把广大日本人民视为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明确表示要采取将日本帝国主义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政策。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又对战后日本的政治走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① 在1947年10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的八项基本政策中,也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外国“使日本侵略势力复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6页。

兴”。^①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重要的宣传机构新华社于1949年1月21日发表了题为《日本的选举与中国》的短评，认为中日“这两大民族可以而且应该建立亲密的友谊”，而现在，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展望，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即将取得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并且明确表示：“无论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愿意与否，人民的中国将要过问对于日本的管制，而日本将要与人民的中国签订和约，并发生经济的政治的关系。”^②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战后日本问题的基本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确立了自己的对外方针，对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政策，这首先体现在主张全面对日媾和，反对片面的旧金山和约上。

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就以新华社时评的名义，提出要迅速准备对日和约。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发布的口号》中，又一次提出要“迅速按照波茨坦协定，缔结对日和约”，“实现日本非军国主义化，实现日本民主化”^③，主张迅速缔结全面的对日和约。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实现了对日本的单独占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成了“美国维持它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地位的关键”。^④美国为了把日本变成其远东的反共战略基地，迅速改变了以往的对日政策，其表现之一便是决定加速对日媾和的进程。在此之前，美国一直反对过早地缔结对日和约。这时，美国一反常态，加速了媾和准备，它一方面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页。

②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34页。

③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39页。

④ [美]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8页。